

中国现代书法大家

于乐著

启功

卷

风流江左有同音，

折简书怀语倍深。

一自楼兰神物见，

人间不复重来禽。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书法大家

启功  
卷

于乐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书法大家·启功卷 / 于乐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303-18187-2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0076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mailto:gaojiao@bnupg.com)

---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16.5  
字数: 295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

策划编辑: 王强 责任编辑: 王强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绪 论 启功的书艺之路 / 1

- 一 艰难求学 / 3
- 二 广师博取 / 7
- 三 国之瑰宝 / 13

第一章 启功书法艺术的演变 / 29

- 一 启功书法的时代背景：近代书法的传统路径 / 32
- 二 启功书法的演变分期 / 36
- 三 影响启功书法演变的重要因素 / 96

第二章 “启体”艺术的解析 / 111

- 一 “启体”的用笔 / 114
- 二 “启体”的结体 / 140
- 三 “启体”的章法 / 164

第三章 启功书法艺术的气象 / 185

- 一 启功书法中的乾德 / 189
- 二 儒释道圆融并包 / 203
- 三 启功书法刚健之气象 / 222
- 四 小结：由人及书 / 227

#### 第四章 启功书法艺术的成就 / 229

- 一 传统书法的一脉相承 / 233
- 二 当代书法的艺术创新 / 238
- 三 答疑解惑，学书法门 / 241
- 四 “当代的王羲之” / 246

#### 参考文献 / 255

绪  
论

启功的  
书艺之路



一  
艰难求学

二  
广师博取

三  
国之瑰宝



启功，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人，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图0-1、图0-2）。



0-1 青年时期的启功



0-2 启功先生像

启功的始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弘昼。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昼被封为和亲王。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去世。

由于爵位累降，到启功的曾祖父那一代，家境已经式微。启功的曾祖父溥良的爵位只是奉国将军，俸禄少得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只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计。溥良的儿子毓隆，也就是启功的祖父，步父亲的后尘，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官至四川学政、主考、典礼院学士。出身翰林又擅长书法的他，对启功的影响非常大。

关于自己的姓氏，启功先生曾经这样回答过别人：“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启功先生曾写下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来表达自己对姓氏的看法：

闻道乌衣燕，  
新雏话旧家。  
谁知王逸少，  
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  
何堪共作场。  
不须呼鲍老，  
久已自郎当。

启功的童年时期，正是中国风云巨变的年代。他出生的前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按照先生的话讲，“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作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

启功先生一周岁时，父亲恒同就因肺病去世了，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逊位，曾祖父溥良绝意政治，不愿居住京城。那时，他有一个门生名叫陈云诰，是位翰林，也是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当时是河北易县的首富，广有资财，出资在易县城购买房舍，请启功曾祖父居住，溥良便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也随着在易县读了几年私塾。

1920年，启功随曾祖父回到北京，先住在鼓楼附近前马厂，以后自己租了房，迁居到东城区黑芝麻胡同14号，一直到1957年。

启功10岁那年，曾祖父因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去世。三月初三，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祖父也病故。这时，因偿还债务，家里经济上已经破产。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不安当中。

1931年，中学还未毕业的启功辍学了，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找份工

作，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当时的他恐怕并没有想到辍学造成的学历问题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启功童年时期接受的是家庭和私塾的双重教育，从五六岁的时候起，他就开始读《论语》，后来又读《尔雅》、《孟子》等。这为他以后的人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启功考进了北京汇文小学。当时汇文小学是北京汇文学校的附属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的教师和校长都是由牧师担任的。教会学校与普通私塾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教会学校，教师讲课，学生听讲做记录，讲解字词的时候先讲偏旁构造，然后再讲字词的意义，力求让学生完全理解。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很丰富，不仅开设有语文和算术课，在课外，师生之间交流也很多。因此，启功在汇文求学期间大大开阔了眼界，进步很快。

1926年，启功16岁时升入了汇文中学。进入中学后，启功没有选择他喜欢的国文，而是选择了商科。因为家境拮据，所以他想通过学习商科，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尽早地找到工作，赚钱养家。在这期间，启功对于学习的认识又有了提高。在当年的同学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能遁世，又不能同流合污，故宁学商，可以苟全性命而已。”令人惋惜的是，启功虽然在汇文中学读了五年，却没能毕业。

启功想早点找到工作，以减轻母亲与姑姑的家庭负担。

启功辍学之后，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教家馆赚钱补贴家用，还有就是四处寻找工作的机会。这种艰难的环境使他养成了他虚心求教的学习态度，磨炼了他刻苦钻研的学习毅力，也让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直面世态炎凉，感悟人生甘苦，教会了他从小与人为善、知恩图报，使他逐步懂得把人生作为一种修行。正是抱着这种态度，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为人所指”，还是众口称赞，他都能安之若素。

在艰难的环境中，启功先生不仅锻炼了自己排除外界环境干扰而刻苦学习的能力，而且也因为挣脱了羁绊束缚，获得了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经过启功先祖老世交的介绍，他跟随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体诗词。戴姜福先生精通古典文学，曾参与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戴先生

精心培养启功，对启功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此时，启功已经年满18岁。对启功来说，最困难的是自己的古文基础不好，以他当时的古文水平，要想读懂《论语》、《庄子》是很困难的。

戴先生告诉启功：“你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但经书是根底，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稍后再读。现在先读些古文。”于是戴先生找了一本木刻本没圈点的《古文辞类纂》，先从唐宋古文读起，自己点句，自己阅读，自己理解。晚上，戴先生还给启功布置十几页甚至几十页的作业。开始时他想：“这些句没经老师讲授，我怎能懂呢？！”但是，老师拿到作业之后，顺文念去，念到点错的地方，就用朱笔挑去，然后另外点在正确的地方。直到这时，戴先生才会讲解这句是什么意思，启功点的为什么错了。启功这才恍然大悟：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或者某个句式，尤其是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就这样，在戴先生给启功量身定制的这种“追赶”式读书方法的指引下，启功硬是读完了一本《古文辞类纂》，后来还读了《文选》以及春秋诸子的散文。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广  
师  
博  
取

就学习书画而言，启功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比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畹、齐白石等先生。他还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

他最初拜贾羲民先生为师作画。贾先生博通书史，作画的技法虽不是那么精湛，但却有非凡的见识，启功跟他学画，继承了他对画不讲究点、皴，不拘定法的思想。贾先生对启功的教诲非常细心，尤其是在书画鉴赏方面，先生经常带着他去故宫博物院看展览陈列的古书古画，从中借鉴、学习古人的技法，并借机尽可能多地教给启功鉴赏方面的知识。当时启功的家境很贫困，所以博物院的这种展览对于启功这样的穷学生来说非常有利——门票便宜自是显而易见，而更重要的是启功得以观摩大量的书画作品，开阔眼界，奠定了他的书画基础。

启功曾回忆说：“我现在也忝在‘鉴定家’行列中算一名小卒，姑不论我的眼力、学识上够多少分，即使是在及格线以下，也是来之不易的。这应当归功于当时故宫博物院经常的陈列和每月的更换，更难得的是我的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品评议论。有时师友约定同去参观，有时在场临时相遇，我们这些年轻的后学，总是成群结队地追随在老辈之后。最得益处是听他们对某件书画的评论，有时他们产生不同的意见，互相辩驳，这对于我们是异常难得的宝贵机会，可以从中得知许多千金难买的学问。”

后来，贾先生看出启功想多学一些画法技巧的心思，就把启功介绍给了吴镜汀先生。

吴镜汀先生是一位传统画家。当时，吴先生学习的对象是王石谷，而贾

先生却一直反对王石谷的画法，因为贾先生认为王石谷的画法太琐碎。不过艺术追求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两人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启功跟随吴镜汀先生学画时，吴先生极为耐心细致，每当启功的画作有进步时，吴先生总是会喜形于色地说：“这回是真塌下心来画出的啊！”除此之外，吴先生还常常给启功指出作画的重要窍门，启功不但得到了鼓励，还不断产生新的领悟，很快取得长足的进步。吴先生教画画，从不笼统空谈，而是经常亲自示范，以求确切地表现出那一家、那一派的特点。吴先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老师，所以即使几十年以后，启功先生还经常回忆起跟随吴先生学画的情景。

启功学画，一方面紧紧跟随老师的步伐，但也不全囿于先生的成路。在跟随吴镜汀先生学画期间，启功既能领会吴先生的笔意，而且还有自己的创意，体现自己的风格。启功擅长画山水、竹石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家境贫困，启功不得不卖画补贴家用，因此有很多佳作在社会上流通，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有许多书画评论家说启功书画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开阔，画态自然，令人回味。

1933年，启功急于求得一份工作以便维持生计。启功的曾祖父溥良的一个门生名叫傅增湘，曾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担任过教育总长，正巧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校董，而陈垣是校长，于是傅先生就打算把启功推荐给陈垣先生，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

傅增湘先生带着启功所写的文章，专程去找了陈垣校长，结果令人振奋。启功第一次呈给陈垣的习作就立刻博得了这位校长的喜欢，他还不停地夸奖启功，认为他小小的年纪就写得这么一手好文章，实在难得。

傅增湘从陈垣处回来后，高兴地对启功说，陈校长看了你的作品，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你可以去见他，并嘱咐启功：“无论工作能不能得到安排，你总要勤向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要重要，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启功牢记傅先生的嘱咐，去辅仁大学拜见了陈垣。

陈垣先生是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清末秀才。他青年时创办光华医学院，与人合办《震旦日报》，曾任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7年辅仁大学正式成立后出任校长。1952年辅仁大学经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又担任北师大校长，直至1971年因病逝世。陈垣学识

渊博，而且善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启功说：“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

陈垣校长十分赏识启功的学识，安排他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授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课。这对出生于教育世家的启功来说，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启功自己也觉得教书育人是世界上最为高尚的职业。

因为学历问题，启功接连两次被解聘，但是陈垣先生坚信启功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如果仅仅因为学历不够就埋没一个人才，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陈垣先生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1938年，辅仁大学秋季开学时，学校聘请启功教授大一的国文课，由于这项课程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握的，所以启功就不会再遭遇被解聘的麻烦了。

自从启功这块璞玉被恩师陈垣先生发现，并安排他在辅仁大学任教以来，他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唐宋诗、历代诗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学识渊博，讲究教法，无论教什么课，启功先生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爱戴并赢得了同辈学者的尊重。他也由助教而升为讲师、副教授。

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陈垣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启功继续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几年后被提升为教授。1952年，他参加了九三学社并被选为北京分社委员。此时的启功，已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的诗、书、画也日趋成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虚心学习，博采众长。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的经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从那时起，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并且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前辈专家学者，如沈兼士、余嘉锡等。沈兼士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精通文字声韵之学，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年轻的启功在沈先生的鞭策、鼓励和提拔之下，被其推荐到故宫博物院兼任专门委员。余嘉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专家，“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扎扎实实、持之以恒”，他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

那时，辅仁大学教师人数不多，上课前下课后，老先生们经常到教员休息

室里来，这间大屋子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可以说是一个“大讲堂”，这里有任何讲堂都学不到的东西；某人的一篇学术论文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本专著的出版，都可以听到重要的评论。“那些评论哪怕只有片语只词，往往有深刻的意义，回去‘顺藤摸瓜’自己再找那文那书来看，真是收获有‘一听三得’之益处。”总之，启功先生善于从这些前辈的言行中汲取学术营养，承继学问之道。

溥心畬和溥雪斋两位先生是启功先生同宗远支的老辈，都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文人，精于诗琴书画。尤其溥心畬，在画界更被称做“北溥”，与南方的张大千齐名。那时，启功先生的书画已小有名气，两位先生都很欣赏启功，常邀请启功去他们家里做客。

溥心畬是近代非常知名的大画家，堪称“一代宗师”，但他偏偏最喜好的是读诗写诗。他关心启功，要启功好好读书，而且非常乐于指导启功作诗，但谈到如何作画，则很随便，常常说诗作好了，画自然会好。启功非常执着地拿着自己的画多次去请教，溥心畬也不好好看，只是问：“作诗了没有？”启功了解了这个规律，就把诗和画一并呈上，甚至诗配画一起，令溥先生不得不起看。

直到后来有一次，启功临摹溥心畬珍藏的画卷，才明白了溥先生一直讲的“空灵”的道理。启功回忆说：“我的临本可以说连山头小树、苔痕细点，都极忠实地不差位置，回头看先生节临的几段，远远不及我勾摹的那么准确，但先生的临本古雅超脱，可以大胆地肯定说竟比原件提高若干度。再看我的临本，‘寻枝数叶’确实无误，但总的艺术效果呢？不过是‘死猫瞪眼’而已。”

在辅仁大学，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许诗英、张鸿祥、刘厚溪、吴培同、周祖谟等一批年轻的同辈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互相启发，确实收到了解难析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真是“谊兼师友”。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同事分散了，只剩下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四位，还经常到陈垣先生在兴化寺街的书房请教学问，聆听教导，人们誉称“校长身边有‘四翰林’，常到‘上书房’行走”。

1956年，第二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著名书画家叶恭绰先生和陈半丁先生共同上交了一项提案，希望“专设研究中国画的机构”。这项提案上交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就通过了这项“专设研究中国画的机构”的方案，

而且还要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不久，新中国的文化部也成立了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在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后，中国画院终于在北京成立了。

画院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特地把叶恭绰从香港请来，任命他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让他主持中国画院的工作。为了发展壮大画院的实力，叶恭绰先生向社会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画家伸出了橄榄枝，启功就是得到叶先生盛情邀请的画家之一。

不过启功却认为自己是北师大的人，教书才是他的本职工作，何况校长陈垣是自己的知己和恩师，他怎能抛弃北师大的教书主业，转去画院工作呢？

于是启功回复叶先生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北师大！”

也许是叶先生太赏识和爱惜启功这个人才了，启功越是拒绝，叶先生的态度就越是坚决。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为这件事情纠缠了很久，最后还是陈垣先生发了话。

陈垣对启功说：“要不就这样，北师大这里的教书工作你不要丢下，以后你可以抽出半天去画院，就算是帮了叶先生的忙吧！”

从那以后，启功就开始了在北师大和中国画院的“双边生活”。在学校里上完课以后，他就赶去中国画院帮上半天的忙。启功也知道，这样的生活很辛苦，但毕竟一边是自己喜欢的教书事业；另一边又是自己醉心的书画事业，所以就算辛苦也是一种享受的辛苦。

被划成“右派”后，启功一家除了精神上备受压抑之外，在生活上，他们的经济状况更捉襟见肘了。启功被中止了在北师大的教书生涯，中国画院的工作同样也被停止。启功只能每天待在家中，以写作度日。

有一次，陈垣先生去逛琉璃厂，发现在荣宝斋展出的一些书画好像是启功家的东西。为了怕弄错，陈垣先生叫来自己的秘书帮助辨认。秘书一看便肯定地说：“没错，这一定是启功的东西。”陈垣心头一惊，随即自言自语道：“没想到启功的家庭生活窘迫到这种程度！”陈垣先生当即把那些书画买下，托人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来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启功对老师的关怀自然很是感激。他发誓，不论遇到多么艰险的环境，他都要坚

持下去，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恩师的一片苦心。

“反右”斗争结束后，启功满心欢喜，他以为“右派分子”的帽子总算戴到头了，自己又可以像往常那样登上讲台授课，也可以继续“摆弄”那些久违的古书古画了。然而，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再次在社会上掀起狂潮，他又成了在这次运动中被审查和被批判的对象。也许是经历了上一次的“反右”斗争，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再次席卷而来的时候，他的内心显得异常平静；也许是他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以至于这次灾难突然来袭，他反倒看得更淡了。内心平静的启功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  
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

这副对联中的“八九间”是有双关寓意的。当时启功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排列在“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八九”之间，在这种处境下，他要发挥所长，尽自己的心力浇灌出一片桃李芬芳、松柏常青的绿地。

没过多久，被挂起来的启功就意外地获得了“解放”。事情的起因和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中央文件有关。启功被调入中华书局工作，参与校点《清史稿》的工作。

启功一直觉得，能把自己的知识交还给祖国和人民是自己的荣幸。通过在中华书局校点《清史稿》这项工作，他完成了这个心愿。经启功等校点的这部堪称中国文化遗产的近代史书《清史稿》出版面世，书中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启功辛勤的汗水和心血。